

“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 历史、动因与前景

娄兆锋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经济建设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状态, 与经济建设领域的“理念—目标—制度”框架密切相关。从工业时代“大变局”下西班牙的经济建设情况和数字时代“大变局”下我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可知, 存在何种“路径依赖”状态, 对一国能否在“大变局”下成功崛起具有重要影响。“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路径依赖”状态的宏观动因是构建、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动因有革新后的经济建设理念强化惯性, 确立目标体制催生强化目标体制的刺激和惯性, 目标体制逐渐成型后会催生既得利益的压力群体, 报酬递增机制和市场交易因素共同强化惯性。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施诸多举措, 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状态。

关键词: “大变局”; 经济建设; 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135(2021)02-0069-09

2017年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 我国必须有效抓住机遇助推国家崛起。从人类发展史来看, 大时代(如大航海时代、工业时代和数字时代)来临之时, 通常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 一个国家身处这种“大变局”时在经济建设领域是否拥有趋向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 对这一国家能否在“大变局”下成功崛起具有重要影响。

经济学领域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是指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一种与物理学的惯性相似的状态, 即制度一旦进入某一种无论“好”或“坏”的路径, 就有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3]。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 1920—201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4]系统提出“路径依赖”的概念后, 学者们纷纷用于分析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其问题, 有效扩大了这一概念的影响力。一些学者将“路径依赖”用于分

作者简介: 娄兆锋(1988—), 男, 山东诸城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公共治理。

基金项目: 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实践探索与理论雏形”(2019dfdxkt056)。

析我国诸多领域的改革过程，如吴敬琏教授指出：诺斯提出的“路径依赖”状态存在于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5]，但要注意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6]，改革开放的艰难印证了诺斯的“路径依赖”洞见^[7]；张平认为，我国目前正打破原有增长路径依赖，出现新的发展方向^[8]；童锋和张革认为，数字经济的出现会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产生影响^[9]；罗必良认为，我国农业经济并非路径依赖而是情境依赖^[10]。这些研究并未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系统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过程中呈现的“路径依赖”状态，研究有待深化。

一、“大变局”下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实例

经济建设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状态与经济建设领域的“理念—目标—制度”框架密切相关。经济建设理念正确与否，对经济建设目标正确与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经济建设目标正确与否，则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建设制度的情况具有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对其他两者产生影响。因此从宏观上看，经济建设的理念、目标和制度相互作用，共同对一国或一地的经济建设情况产生影响。从工业时代“大变局”下西班牙的经济建设情况和数字时代“大变局”下我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可以看出，存在何种“路径依赖”状态对一国能否在“大变局”下成功崛起具有重要影响。对身处“大变局”的国家而言，是否构建良好的经济建设“理念—目标—制度”，决定着国家呈现催生良好结果还是负面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

（一）工业时代“大变局”下西班牙经济建设

在大航海时代“大变局”（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中，西班牙有效抓住机遇，成功实现崛起，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工业时代“大变局”（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出现后，西班牙诸多举措逐渐催生负面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即路径闭锁状态），这是西班牙在工业时代“大变局”中相对衰落的重要原因。

大航海时代“大变局”出现后，西班牙全力殖民扩张，从美洲各地大量掠夺黄金白银及诸多原材料。运抵西班牙本土后，有效支撑了王室、贵族及中上层民众的奢靡生活。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些享受奢靡生活的群体（核心是西班牙的实际统治群体）不再高度关注国内的工农业发展，而是运用获得的金银向其他欧洲国家（如英国）购买国内所需商品。这一举措实际上将西班牙置于危险境地：一旦来自美洲的金银及其他原材料供应中断甚至终结，西班牙将急剧衰落。这种可悲的情况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末，1810—1826年，拉丁美洲爆发独立战争并获得独立，西班牙不可能继续从拉丁美洲掠夺黄金白银及诸多原材料。为了维持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西班牙更加依赖“羊主团”。最终，有效的产权制度及相关制

度并未得到构建，逐步走向负面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即路径闭锁）。

从大航海时代“大变局”中的经济建设情况看，西班牙的经济建设“理念—目标—制度”框架存在明显问题。首先，经济建设理念存在问题。西班牙王室、贵族及中上层民众的经济建设理念，是从美洲各地掠夺资源及原材料、依靠“羊主团”获取资金，用以支撑奢靡生活，而非基于这些资源展开西班牙国内经济建设。美洲殖民地独立后，西班牙经济举措发生改变，但经济建设理念并未变化。其次，经济建设目标存在问题。西班牙统治阶级压榨美洲殖民地及依靠“羊主团”的目的，是支撑自身的奢靡生活。再次，经济建设制度存在问题。西班牙统治阶级并未基于“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制度，将获取的资金及原料等投入“高阶”生产过程，而是将黄金白银及资金用于消费，原材料则在简单加工后进行销售。这都未能有效助推西班牙的经济建设。

（二）数字时代“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

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始于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初是这一“大变局”的酝酿期，我国经济建设明显存在能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将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末，我国开始进入数字时代，经济建设逐渐从实体空间扩展至虚拟空间。从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重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观框架后，诸多具体制度不断构建和完善，明显存在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从实体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也伴随制度得到构建和完善，同样存在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实际上，从GDP增速就能分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领域出现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从宏观背景来看，这种路径依赖状态存在于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能够有效助推我国在数字时代“大变局”下持续崛起。这种路径依赖状态的强弱，对我国持续崛起的速度快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经济建设情况看，我国的经济建设“理念—目标—制度”框架，有效催生了能够产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首先，我国经济建设理念是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推经济发展。理念正确，为我国经济建设进程的有效推进提供良好保障。其次，我国的经济建设目标是有效推进经济建设进程，并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一经济建设目标，有效吸纳诸多经济建设主体积极参与经济建设进程，为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再次，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优化了我国的经济制度，助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

二、“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动因

在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能够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归因于多个方面，具体可以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

（一）宏观动因

数字时代“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能够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是经济建设“理念—目标—制度”框架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催生这一状态的过程中，这些因素的作用大小存在一定差异。宏观上看，这一状态的动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一直坚持正确的建设理念，致力于实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坚持和完善，在经济建设“理念—目标—制度”框架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能生成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

（二）微观动因

1. 革新后的经济建设理念强化惯性。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导致相应的组织和主体的经济建设理念较为僵化，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面临的困难。而且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目标尚未明确，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才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这一经济体制得到有效构建并显著完善后，各组织和主体的经济建设理念得到革新，贯彻到诸多经济政策中，并有效发挥作用，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由此形成经济建设的“惯性”。类似情况也出现于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开展数字经济建设初期，一些组织和主体持质疑或观望态度，甚至误认为推进数字经济建设会使我国的经济出现“泡沫化”情况，因此不愿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经济建设。近年来，我国的数字经济建设获得长足发展，建设目标已经明确。原本仅存在于实体空间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于虚拟空间中并获得完善。这些情况共同助推诸多组织和主体的经济建设理念有效革新，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建设“惯性”。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的经济建设“惯性”，强化了经济建设理念、目标和制度的实践、实现和运行基础，强化了经济建设过程中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

2. 确立目标体制催生强化目标体制的刺激和惯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建设领域诸多主体共同对存在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也受到极少数主体一定程度上的抵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些主体已经“闭锁”于计划经济时代末期带来不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中。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后，这些主体的经济理念逐渐变化，经济建设阻力随之弱化。改革目标实现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

标。这意味着强化能够生成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的难度变小：与将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度较低。因此，经济建设过程中诸多主体会积极参与坚持和完善经济体制，而非试图用另一种经济体制加以替代。遵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使得经济体制表现出报酬递增并实现自我强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由此催生能够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

3. 目标体制逐渐成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催生既得利益的压力群体。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表现明显，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发展红利、共享改革成果。在我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后，经济改革成效逐渐显现，最广大人民群众获益的同时，也出现既得利益的压力群体。压力群体参与经济建设活动，对我国践行经济建设理念、实现经济建设目标、完善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助推经济建设过程中生成能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压力群体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集团明显不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广大人民群众是既得利益压力群体，他们获得的是合法利益。这种高覆盖的利益群体体量越大，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越难以出现不平等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来都是精英群体而非最广大公民，且某些利益集团甚至用非法手段获益。这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越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越严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催生的既得利益压力群体，为了扩大受益程度，即更好、更多地共享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会积极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第一，对这些既得利益的压力群体而言，与将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坚持和完善后者需要投入的成本较少，且能够获得明显收益。第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保障他们继续共享经济建设成果。第三，在前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这些群体实际上已经进行大量投入，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阵痛”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投入可以视为“沉淀成本”。如果不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沉淀成本”有可能付之东流。因此，积极支持或有效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成为这一群体的最优选择。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理念得到践行，经济建设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从而在“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强化了会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

4. 报酬递增机制和市场交易因素共同强化惯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将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使诸多人群明显受到报酬递减机制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失业的国企员工对改革存在怨言。但这只是我国革新经济建设理念和经济制度过程中出现的短期现象。当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后，受到报酬递减机制影响的人明显变少，与之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受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愿意继

持续推进改革，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形成“惯性”。进入21世纪后，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呈现，前述“惯性”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表现为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我国的经济建设目标得到良好实现，经济制度也日益完善。

除报酬递增机制之外，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因素，也能够强化惯性、催生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首先，我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长期目标，投入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后，坚持和完善经济体制的追加成本明显下降。由此，经济建设过程中诸多主体会倾向于进一步完善这一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建设目标、完善经济制度的难度随之变小。当然我国开始发展数字经济之初，初始设置成本较高，尚未有效助力我国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及经济制度的完善。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追加成本明显下降，参与发展数字经济的主体也倾向于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相关制度。由此形成一种惯性，受益于数字经济的群体日益增多，助力了我国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其次，数字经济体制建立前，诸多组织、主体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相对较低。但在数字经济体制得到有效推进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且能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合法获利的组织和主体显著增多，推动了这一转型惯性的增强。第三，我国经济建设进程稳步推进，使不同主体之间、不同主体与制度之间、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协调机制持续强化，由此出现较强的协调效应，继而有效强化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惯性”。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后，经济建设或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明显下降，使诸多组织、主体明确注意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能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成的制度矩阵会催生诸多递增报酬，进而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的动力，实质上也强化了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惯性”。

三、“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前景与推进路径

（一）“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前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建设理念出现了重大变化，将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这一过程中逐渐构建了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并生成能够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数字时代全面来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呈现，我国的经济建设理念再次出现变化。在党中央领导下，诸多经济建设主体逐渐认识到，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从实体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推进、协调这两个空间中的经济建设，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建设水平。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经济建设成果，同时存在于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上述变化最终扩展了我国

经济制度的影响范围，我国经济制度开始具有数字时代特征。这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数字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论述看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现代化进程获得进一步推进。受经济建设“理念—目标—制度”三方面变化的影响，原本存在于实体空间经济建设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状态，也随之出现在虚拟空间经济建设过程中。从宏观视角来看，在虚拟空间经济建设过程中作用则受到更多关注。对诸多组织和主体而言，数字经济领域的报酬递增机制能够带来更多收益。受这一经济建设理念的影响，这些组织和主体十分关注且支持数字经济领域诸多机制、法规、政策等的构建、制定或出台，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数字经济建设。这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将更多地从中获益，助力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目标。这种情况下，在数字时代“大变局”中，与实体空间的经济建设相比，有效推进虚拟空间经济建设进程能够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这一举措十分引人注目，能够给诸多组织和主体等带来更多收益。

（二）“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推进路径

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能够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的宏观路径是：基于我国的经济环境、经济建设理念和建设目标，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而言，“坚持”是指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经济建设目标及基本原则等，如经济建设过程中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效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有效强化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完善”是指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随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其中与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政策、法规等，严防出现“旧体制—新环境”的组合。

与宏观路径相对的是微观路径，主要包括：

1. 进一步革新经济建设理念。经济建设理念的“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如20世纪末，与“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理念相比，“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念是新的；近年来，仅仅在实体空间中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念已变得陈旧，最新的经济建设理念是“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有效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见，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继续推进经济建设过程须进一步强化能够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革新诸多组织和主体的经济建设理念，以强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惯性”。具体举措，如深化相关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为诸多举措的实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借助宣传、教育等方式方法，使诸多组织和主体明晰进一步革新经济建设理念的重要性。这些举措的实施，能促使各组织和主体进一步革新经济建设理念，扬弃旧理念，为数字时代“大变局”下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的强化创造条件，助力我国的持续崛起。

2. 进一步强化目标体制生成的刺激和惯性。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尤其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切实注意完善正式规则，使之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经济建设环境，充分发挥对经济建设所具有的持续推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强化目标体制生成的刺激和惯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非正式规则的积极作用。与正式规则相比，非正式规则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作用。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和演变较为缓慢，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内生性。因此，非正式规则成为一些国家经济体制区别于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各组织和主体有必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借助正式规则有效规范非正式规则，降低乃至消除非正式规则的消极作用^[11]，为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建设领域强化能够带来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创造良好条件。

3. 切实、有效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我国将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进入 21 世纪后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最重要目标之一是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成果。从近几十年的情况看，这一目标得到了良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确实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共享发展红利。为了在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一步强化我国经济建设领域催生良好结果的“路径依赖”状态，有必要切实、有效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形成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压力。具体举措，如进一步完善经济建设领域的诸多法律法规^[12]，为经济建设过程中诸多组织和主体依法参与经济活动，获取合法领域创造有利环境；严惩经济建设过程中非法获取利益的组织和主体，优化经济建设环境，同时对其他组织和主体形成有效威慑。

4. 进一步强化报酬递增机制和市场交易因素的积极作用。第一，促使经济建设领域的诸多主体明晰：完善一种体制所需的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低于构建新体制所需的成本。因此，当前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非构建全新的经济体制。第二，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注意强化相关组织、主体等的学习能力，提升其适应程度。第三，进一步优化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不同主体与制度之间、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协调机制，强化协同推进经济建设的态势。第四，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基于经济制度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良性作用，有效强化递增报酬，进而助推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携手打造合作共赢的中非命运共同体[J]. 中国总会计师, 2018 (9) : 8.
- [2] 曹冬英, 王少泉. 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J]. 天中学刊, 2020 (1) : 26-33.
- [3] DAVID P.A.Path Dependence: A Foundational Concept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J]. Cliometrica, 2007(2):91-114.

- [4] HALDANE F.D.M.Path dependence of the geometric rotation of polarization in optical fibers[J]. Optics Letters, 1986(11):730-732.
- [5] 吴敬琏. 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J]. 改革, 1995 (3) : 57-59.
- [6] 吴敬琏. 如何打破路径依赖[J]. 新经济导刊, 2011 (10) : 14-15.
- [7] 吴敬琏. 再看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J]. 党政视野, 2015 (12) : 49.
- [8] 张平.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变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演进机制构建[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10) : 37-49.
- [9] 童锋, 张革.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独特优势及路径依赖[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 (2) : 262-266.
- [10] 罗必良.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抑或情境依赖?——兼论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及未来趋势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1) : 38-51.
- [11] 周思锐, 申明锐, 罗震东. 路径依赖与多重锁定: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建设解析[J]. 经济地理, 2019 (6) : 183-190.
- [12] 郑翩翩, 孔祥纳. 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行政法的路径依赖与帕累托优化[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20 (1) : 48-53.

(责任编辑: 李虎)

On “Path Dependence”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reat Change”: History, Motivation and Prospect

LOU Zhaofeng

(Marxism Research Center, Jina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CPC,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Path dep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dea-objective-system” framework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mpari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Spain with China’s under different “Great Changes”, the industrial age and the digital age, the existing “path dependence” is important for a country’s successful rise under the “Great Change” influence. The macro motivation of “path dependence”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to build, to uphold and to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icro-motives include the enhancement of post-reform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ncep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arget system and the way to promote its stimulus and inertia; the pressure group that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with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trengthened inertia by increasing reward mechanism and market transaction factors jointly. Implementing many measures at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help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ath dependence”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reat Change”.

Keywords: “Great Change”; economic construction; path dependence